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中国当代文学60年

张志忠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中国当代文学60年

张其成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新编高校中文专业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与已有的同类教材相比,它的特色是:在时间上,及时追踪和萃取当下的文学创作成果,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限延伸至 21 世纪初叶,在诸多教材中第一次将网络文学和“80 后”创作等现象纳入视野,保持了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开放性和当下性;在空间上,以“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追求,以及发展时空上的错落有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通俗文学创作的多元景观,力求整合中国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为一体;在文学观念上,取一种开放而驳杂的姿态,将影视文学、旧体诗词和儿童文学等,都融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使其获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在教材中心的设定上,侧重于选取经过时光淘洗的优秀作家作品,以作家论为中心,以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主,以提高学生解读作家作品的能力和培养文学鉴赏力为着眼点。同时,为切实可行地指导学生的自学,在教材中专列了思考题和学习指导文献篇目。

本书既适用于高校中文系和校级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的教学,也可作为文学爱好者了解当代文学的介绍性、欣赏性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 60 年 / 张志忠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04 - 026312 - 1

I. 中… II. 张…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651 号

策划编辑	袁晓波	责任编辑	李健秋	封面设计	王 晔
版式设计	余 杨	责任校对	杨雪莲	责任印制	韩 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 - 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90 000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免费咨询 400 - 810 - 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m.com>
<http://www.landracom.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2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6312-00



导 论	1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主体形态的大陆文学	1
大陆与台港澳文学的共生与互动	7
政治制约、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互补	10
本教材的编撰要则和学习要求	15
 第 一 编 1949—1976	
第一章 作为时代先声的诗歌	17
新生活的歌手们	19
蔡其矫：大海和自由的歌者	22
郭小川：战士自有战士的品格	24
第二章 叙事与抒情因素此消彼长的散文	27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诗意化散文	28
政论性和知识性的不同取向：徐懋庸和邓拓的杂文	33
第三章 为新生活写真的小说	36
乡村画卷与历史真实	36
赵树理：乡村生活的喜剧与沉思	39
周立波：茶子花香 月色迷离	43
孙犁：儿女情怀与时代云烟	46
时代大潮与个人心灵：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48
第四章 创造英雄史诗的小说	51
燕赵大地的英雄谱系：梁斌的《红旗谱》	53
青春燃炽与艰辛选择：杨沫的《青春之歌》	55
为历史注入现代魂魄：姚雪垠和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	57
第五章 别辟蹊径的话剧和电影	62
“第四种剧本”与历史剧	63
老北京生活的长卷：老舍的《茶馆》	67

《早春二月》及夏衍的电影文学改编	70
集民歌艺术大成的“山歌片王”：《刘三姐》	72
第六章 “文革”文学：主流和潜流	75
《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的得与失	76
穆旦、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地下写作	79
新一代人的迷惘与寻找：《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	84
聂绀弩的“三草”和启功的“打油”	87

第二编 1976—2009

第七章 诗歌的喧哗与骚动	92
时代转变中的悲歌与欢歌	92
归来者的精神造像	93
“朦胧诗”浮出水面	99
西部风景：“新边塞诗”、昌耀与巴蜀诗群	110
“他们”和“海上诗群”等诗人	116
“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	121
海子、骆一禾与转型期的诗歌场域	124
走向成熟和深邃的“中年写作”	128
在新的躁动中向纵深地带延展	134
第八章 疏离与拓展中走向从容的散文	139
展现科学家的诗意人生：徐迟和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140
追问历史、追问灵魂：巴金的《随想录》	143
晚年孙犁的乡情与书情	146
杨绛：“隐身哲学”及缄默的智慧	149
史铁生：生命意义的追寻	152
周涛：宽广与辽阔汇聚的大气	155
贾平凹：寓灵秀于拙朴	157
文化良知与仪式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159
苏叶、唐敏、斯妤、叶梦：“我们终其一生为谁而受奴役”	161
第九章 进入黄金时代的小说	167
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拓展	168
王蒙的《春之声》和《蝴蝶》等“东方意识流”小说	170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与乡村变迁	173
张贤亮的“章永璘系列”及知识分子自省	176
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179

陆文夫的苏州小巷风情·····	182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185
“道禅一炉”:阿城的《棋王》·····	188
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长恨歌》·····	190
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马桥词典》·····	194
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	198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和《金牧场》·····	201
莫言笔下神奇的乡村世界·····	204
先锋文学和马原、余华的创作·····	207
刘索拉的“功能圈”荒诞与残雪的“小屋”梦魇·····	211
王朔:书写市场化时代的“顽主”·····	215
池莉笔下的小市民风景·····	217
“民族秘史”的追求:陈忠实和《白鹿原》·····	221
王小波:生命和欲望对“黄金时代”的颠覆·····	223
滌罪重生:铁凝的《大浴女》及其他·····	228
陈染、林白、徐小斌:女性文学的初创与深化·····	231
“爱”到《无字》:告别纯情之后的张洁·····	237
边缘人视角的新奇发现: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空山》·····	240
毕飞宇:江南水乡的韵致与情怀·····	243
第十章 创新意识主导下的戏剧、电影 ·····	247
高行健和魏明伦的探索戏剧·····	248
乡村叙事的新方式:《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	254
孟京辉的《思凡》和黄纪苏的《切·格瓦拉》·····	258
《红色娘子军》到《芙蓉镇》:传奇谢晋·····	265
陈凯歌、张艺谋和第五代的电影创作·····	268
冯小刚:当代中国商业电影的典范·····	274
“警匪”加“言情”:海岩的电视连续剧创作·····	277
 第三编 台港澳文学(1949—2009)	
第十一章 台湾当代文学 ·····	281
纪弦:接续现代派诗歌的薪火·····	284
洛夫:“石室”与“望乡”·····	287
摇曳多姿的王鼎钧散文·····	290
左诗右文、妙语连篇的余光中·····	293
郑愁予:美丽乡愁与古典情怀·····	297

非马:异域意象与“异类”思维	300
林耀德:现代都市的守望精灵	303
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与林海音的“城南”追忆	306
白先勇的“纽约客”与“台北人”	310
陈映真的时代省察与黄春明的乡土宜兰	313
新生代作家黄凡、张大春的小说	320
李昂的女性主义小说	325
台湾新电影的两面旗帜:侯孝贤与杨德昌	329
东西合璧的李安电影	333
第十二章 香港和澳门的文学	337
也斯:从认同“城影”到反思“后殖民食物”	338
金庸的武侠世界	341
刘以鬯和舒巷城的小说	344
李碧华的奇情小说和影视文学创作	349
王家卫及其光影怀旧	352
澳门文学概述	354
 第四编 当代儿童文学及新媒体文学	
第十三章 当代儿童文学	358
葛翠琳、汤素兰、王一梅和保冬妮的童话	361
柯岩、金波和高洪波等的儿童诗	365
曹文轩、秦文君的儿童小说	370
林良、林焕彰等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374
第十四章 流行歌曲与网络文学	379
罗大佑:“滚滚红尘”中的绵绵情思	379
崔健:“红色”如何“摇滚”	382
网络文学:从痞子蔡到安妮宝贝	384
第十五章 “80后”文学的创作潮流	391
“80后”文学的三大文化背景	391
“80后”文学作家作品简析	394
 后记	401

导 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文学史家族中一门年轻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学科。自1949年当代文学的大幕拉开之后,对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就一直在文坛和高校中同步进行着。同样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当代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成为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元素。至于高等院校中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得到确认,以及各种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和出版,则是集中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当代文学史时间长度的延伸,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兴盛,对当代文学现状的评论,对当代文学历程的追溯和总结,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序列,成为一个新的学科。^①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在学科内部,论争纷起,新见迭出,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热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性质、起点、范畴、历史分期、基本特征和典范性的作家作品遴选等等,都充满热烈的争论和不确定性,可以说,在文学史家族中,它的形态最活跃也最具有可变性。我们在这篇导言中所简要阐述的,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主体形态的大陆文学;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并生和互动;政治制约、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的互补;本教材的编撰要则和学习要求。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主体形态的大陆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范畴,涵盖了大陆和台港澳,构成它的主体形态的是大陆文学。这不仅是因为,在这几个板块中,大陆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所占比重最大;相应地,大陆的作家、作品数量和文学的接受者最多。这也不是因为,大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祥和传承的中心地域,可以以传统文化的中心和文学创作的中心自居。数量和质量,中心和边缘,并不是评判的必然尺度。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我们所要考察的历史时期,大陆这广袤的地域上,在应对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中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正是这片农耕文明最具典范性的土地和生活劳作其上的人民,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和最艰辛的努力,经历过最剧烈的社会震荡和心灵震撼,鲜明地展露出东方的古老民族在现代化转

^①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的萌生和成型,温儒敏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11章《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学科发展》有缜密的描述,见该书141—1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型时期,应对全球化大潮时的典型特征。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基本走向和未来命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制约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表现得最为丰富多彩,折射出东方文化现代转型的最强烈的阵痛和艰难。如果我们认可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的命题,那么,大陆文学在当代中华民族心灵史中,显然占据了最为重要的篇章。

以“第一次文代会”为开端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中华民族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也是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第一次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达半个世纪的台湾回归中国,香港也摆脱了日军的占领。但是,和平建国的契机稍纵即逝。在国共内战中,获得中国广大民众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以新兴者的雄强姿态,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为号召,打败了比自己强大许多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文化人和作家们,在这时代烽烟中,作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大多数文艺家带着他们对新时代和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憧憬,集聚在新中国的旗帜下。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简称为“第一次文代会”),这次会议确立了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它实现了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选举产生了全国统一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全国性的和各省市文艺机构主办的各种文学艺术刊物创刊,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相继创办,为作家艺术家发表创作和评论提供了充分的园地;强调文学要面向工农兵,面向现实生活,以及新中国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则为文学赢得了数量空前的读者群。以“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中国当代大陆文学掀开了它迄今为止长达60年,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壮大、风雨兼程的动人篇章。

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

纵观6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当代大陆文学的主潮是什么?这就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

这一命题,受到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启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说: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所谓想象,是说世界上即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

多数的同胞,他们之间不可能直接接触,或者甚至不曾听说过彼此;然而,他们相互联结为一体的意向却弥散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所谓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形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就是,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和表达民族情感的小说,塑造共同的心灵体验和感觉—认知空间,形成一种独特的凝聚力,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①以是观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面对列强瓜分、群雄割据的危难局面,将对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方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便有了理论的依据。梁启超将改造国民性的使命赋予“新小说”,力倡“新民说”,他的《新中国未来记》展现了对未来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充分想象。刘鹗《老残游记》中狂风骇浪里的“破船”意象和那种回天无力报效无门的感愤,鲁迅观看日俄战争中日军杀戮中国同胞的幻灯片时的切身体会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日渐沦亡的民族命运的焦虑,对民族危亡的道义承担。郁达夫的以个性压抑和青春苦闷为着力点的《沉沦》,“曲终奏雅”发出的是对孱弱衰败、无力保护其子民的祖国何日能够强大繁荣的呼唤,以唯美情怀写出《雨巷》的戴望舒,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写出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用诗句抚摸想象中的中国土地的温热悲凉。在经历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长达百余年间的苦难与血泪,强敌入侵与瓜分危机,民族觉醒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自救和抗争之后,当新中国建立之时,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新国度如日初升的时代远景,展现在面前,怎能不让和全民族一道饱经苦难沧桑的作家们为之驰骋情怀、放声高唱呢?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中国当代大陆文学曾经有过高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如今天被称作“红色经典”的诸多作品。它们对曾经企盼已久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的热烈赞颂,具有相当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合理性。在后来人眼中,这种对民族新生的颂扬,相信革命能够克服一切社会弊端的极度乐观主义,以及对新时代的阴影和灾难的有意无意的遮蔽和回避,都可能显得极为幼稚可笑。但是,如果真能对历史抱有“同情的理解”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文学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热烈认同和想象,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段,都表现得分外突出——后者的语境与50年代不同:刚刚走出了10年浩劫,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理想主义是二者的共同特征;前者是天回地转,希望重生的时代转折;后者是满目苍凉、百废待兴的困难局势。前者是刚刚取得的胜利使得人们有信心重新高扬理想主义,有勇气克服现实的矛盾,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想象亦产生共鸣;后者则是进入历史的新时期后人们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① 吴叔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9—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和认同,是以昂扬奋发的姿态重张理想主义的旗帜,是“未来在召唤”的心灵回应,是“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美好畅想,文字间涌动着的是仍然是炽热而殷红的鲜血,而且和 50 年代异曲同工。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解从朦胧变得清晰,实现民族现代化的目标更为明确,对曾经遭遇过的巨大挫折记忆犹新,因此,对现实的批判和反省,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和追问,也成为追求理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了。

中国当代大陆文学的历史分期

中国当代大陆文学的历史分期,以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为界,大致分为两个不同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76 年,中国大陆走过了昂扬亢奋又沉重迂回的历程。作为时代精神之反映的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从对新生国度的热烈赞颂开始,却以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与反思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这是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从战争和苦难进入和平和建设的时代,人们的欢欣鼓舞用人间的语言已经难以表达,于是,来自天穹的隆隆雷声,便把这人间欢歌传遍四面八方。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是以文学的方式,告别一个充满了屈辱和血泪的既往,歌颂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展现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所付出的流血牺牲、浴火重生,表达新时代到来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欣喜和无限希望,同时思考和塑造具有新的时代风貌的当代新人形象,展望新中国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发展的可喜前景。由这一基调构成的这段文学史,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和农业合作化题材成为其主流选择。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控制,保持文化的统一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界予以特别的关注,文艺的兴衰背后都有着政治这个巨大的杠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到来,则把作家纳入了管理严格的一体化生产体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思想斗争此伏彼起,文学的表现领域越来越窄,风格和方法的多样性都黯然退场,文学自身越来越失去了弹性和活力。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样板戏和语录歌成为当时仅有的文艺作品,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到 1975 年,毛泽东对文艺现状提出严厉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①与此同时,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阴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443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谋集团抓紧炮制一批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如话剧《盛大的节日》、电影《反击》等。郭小川在1975年秋天所作《团泊洼的秋天》中的诗句“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总会生根发芽”,表达出在特定环境下抗争和困惑相交织的情绪,也预告了1976年清明节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爆发的以诗歌为武器的悼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1976年至今,是第二个历史时期。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从组织上清除了危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巨大隐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文学创作都开始出现转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赋予人们评价历史和考察现实的强大思想武器,指引人们从现代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泥潭中超拔出来,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建国以来的一桩桩冤假错案被纠正,许多无辜受迫害的作家重返文坛,年轻的文学新人不断涌现,作家群体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在经过长期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苍白之后,人们对于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有着迫切的需要,为数众多的文学类报刊和众多的文艺出版社的成立^①,为作家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文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震撼力,充当了披坚执锐、拨乱反正的先锋。作家们密切关注现实,痛切追询历史,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疾声呐喊。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得到继承。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在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开篇之作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中得到回响;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韩少功的《爸爸爸》,则被认为是对阿Q精神的当代书写。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张扬,对封建专制主义、愚民政策的清算,对现实中亟须改变的不合理现状及历史遗患的抨击,成为文学的主导趋向。鼓舞人们进行筚路蓝缕的开拓的,是正在铺展开来的民族和国家新的希望和理想,如舒婷的诗句表达的那样,“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力,是20世纪50年代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劫归来者,以及与他们年龄相近的中年作家,知青和他们的同龄人则以最活跃的身姿、最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充当了文学变革的先锋。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学变革的

^① 在建国初17年,大型文学刊物只有上海的《收获》,而且还时出时停,“新时期”以来,篇幅达200页以上的大型文学刊物发展到数十家,几乎每个省市区都新建有独立的文艺出版社。

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大陆结束了长期的自我封闭和思想禁锢之后,改革开放带来的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涌进。表现在文学中,是对世界文学的广泛借鉴和转益多师。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直至当代的世界文学,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都被纳入中国作家求新若渴的视野之中。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大陆的社会变革驶入了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市场的力量,给社会生活增添巨大的活力,也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新时期文学狂飙突进,高潮迭起,曾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却在波涛汹涌的市场化时代黯然失色。无法直接兑换为货币的精神,不能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消费需要的高蹈理想,难以全部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一度陷入一种尴尬和失落的境地。作家曾热烈地呼唤未来,瞩望新的曙光,新的现实却让他们困惑不已。于是,文学还需要不需要理想,作家面对市场化时代如何选择,精神追求是否必须让位于金钱享受,成为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焦点。作家的不同选择和精神取向,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的激烈论战,也促成作家队伍的分化。这些都构成市场化时代的文学新格局。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侵蚀文学的精神追求的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使文学的自由度得到了极大扩张。它为作家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出现了一批体制外的,靠稿费维生的自由作家。出版物的市场化,各出版社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人们的闲暇时光的增加和对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的需要,以至影像光碟和家庭影院设备的出现,也促进了文学和戏剧影视的繁荣。据统计,建国初17年共出版长篇小说320部,时至今日,每年经由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到1000部以上。汇集当代高科技成果的互联网的建成和扩张,网络文学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立即受到众多年轻人的欢迎。自由写作、自由发表和自由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由此得到实现。各文学网站所发表的作品加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出现了一批网络文学作家,与纸介质文学形成一种互动。

在经过短暂的惶惑和调整之后,作家们迅速地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找到了新的位置。以王朔等为代表的市民情趣和市场化写作,得风气之先,形成一道新的文学风景线。对市场化的急功近利和拜金主义持严峻批判态度的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李锐等,构成了文学向度的另一极。在物欲膨胀的年代,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精神操守、重义轻利,乃至其“仁义道德”的一面,都被重新发掘出来,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唐浩明的《曾国藩》等。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市场化时代文学的重镇:变化迅速的时代,人们需要从文学中获得认知现实的启迪,加强把握现实的能力,发出对现实褒贬憎爱的迫切心声。从“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写作”,文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被遮蔽的生活底层,引向乡村和工厂的弱势群体。以“反腐倡廉”这一市场化时代最为民众关注的社会焦点为

创作主题的作家作品,如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形成了良性的品牌效应。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小说家,翟永明、唐亚平等诗人,苏叶、斯好等散文家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共同筑就了女性文学崛起的新景观。“80后”作家的涌现,则给文坛和读者带来许多新的话题。时至当下,大陆文学仍然在喧哗与骚动之中日渐走向开阔和繁茂。

大陆与台港澳文学的共生与互动

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是毫无疑义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和叙述这一整体。我们认为,台港澳地区文学不只是大陆文学的补充,大陆和台港澳文学不但是在一个共同的时空中存在和发展,而且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关节点,以此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共同起点,也是可行的。这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大陆溃败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台湾岛上立定了脚跟,与大陆隔海对峙数十年,但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而香港和澳门,随着大陆对港澳政策“维持现状,长期利用”的明确,也获得了稳定的发展机遇。尽管说,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在50年代以降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各自的动荡和彼此的冲突;但是,在之后的发展中它们都转向了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以各自的方式和路径寻找通向现代性的强盛之路,为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完善各竞短长,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作为这一时代风云和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折射的大陆与台港澳文学,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次第展开,共生互补,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与整合,共生与互动。

文化资源与流脉的共生互动

就文学资源而言,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所共同面对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和20世纪前半叶的新文学的成果。而且,它们之间,在发展进程中,也不乏互相推动、融合的佳话。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改变了大陆文学的根本走向,在台港澳地区也引发了热烈响应。20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双璧,被称为“台湾新文学的清道夫”的张我军和“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都是在大陆求学、行医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把新文学运动的火种传递到了台湾。20年代末期,出生于台湾的刘呐鸥,将日本“新感觉派”文学思潮带到了上海,和穆时英、施蛰存等一道,以其颓唐凄艳的风格,成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景。台湾作家杨逵的名作《送报夫》,原作是日文,将其翻译为中文的是大陆文坛的风云人物胡风。与之相媲美的是,恰恰是这位被誉为“压不扁

的玫瑰花”的杨逵,最早将鲁迅的《阿 Q 正传》翻译成日文在台湾出版。香港新文学的开路人倡伦,1927 年投身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任职,1928 年在被誉为“香港文坛第一燕”的刊物《伴侣》上发表白话小说《殿徽》、《O 的日记》,同时也在上海的《现代小说》等刊物发表作品。30 年代,受到世界性的“红色的 30 年代”和大陆左翼文学的影响,台湾的社会和文坛也曾出现左翼思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大陆的作家们两度汇聚香港,茅盾、萧红、戴望舒、许地山、张爱玲等,都在香港写出了自己的名作。倡伦的《穷巷》,黄谷柳的《虾球传》,这两部香港新文学史上问世较早的反映本土生活的长篇小说,则是在寓居香港的夏衍主持的《华商报》副刊上连载的。

1949 年之后,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交流上产生了严重阻隔,从鲁迅到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都成为禁书。在大陆,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倾向上有问题的作家作品和通俗文学作品,也都渐渐退出人们的阅读视野。但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却仍然以各种方式在进行。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新文学的大批重要人物留在大陆,胡适、林语堂、许寿裳、台静农、谢冰莹、苏雪林、梁实秋等则把新文学的经验带到了台湾。50 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无论是女性文学草创时期的苏雪林、谢冰莹,还是倡导现代派诗歌的纪弦和覃子豪,都是从大陆迁来台湾,在大陆时期就已成名或有作品问世。大陆作家林斤澜的《台湾姑娘》与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形成隔海对话,带来了海峡彼岸的空谷足音。《阿 Q 正传》的手抄本在台湾学生中间流传,鲁迅著作深刻影响了陈映真等人的创作。台湾作家陈若曦 60 年代中期来到大陆,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狂潮恶浪,她的《尹县长》等小说,成为大陆“伤痕文学”的先声。香港则因为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和内地的交流就更加频繁。50 年代以来,从老一代的著名作家叶灵凤、曹聚仁,到来港后名声大噪的阮朗、金庸、梁羽生、陶然,香港文坛一直活跃着大量来自大陆的文人。阮朗的《金陵春梦》(署名唐人)也成为大陆流传甚广的“内部”读物。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浪潮,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都得到了各自的传承。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大陆开始工作重心的转移,如邓小平所言,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而蒋经国治下的台湾,也开始了向民主社会的转型。香港回归中国的日程既定,过渡期的香港,社会心理和政治热情同样空前热烈而惶惑。以此为基本特点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后 30 年,大陆和台港澳的文化交流和文学互动进入了新的良性发展阶段。1979 年,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在大陆的文学刊物《当代》创刊号上刊发,引起热烈关注,被誉为“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首先是在香港报纸上连载。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商业化的文学、音乐、电影、电视剧,如金庸、古龙、梁羽生、黄易等的武侠小说,

琼瑶、亦舒、李碧华等的言情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李安、王家卫的电影，以及大量的武侠和言情类的电视连续剧，都使得在大陆中断数十年的通俗文学得到意外的弥补，也促进了大陆同行的创作。

时空语境的相同与相异

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命题，是在时空语境的既有相同又有相异的条件下形成的。比如说，台湾和大陆都曾经先后兴起过留学欧美的热潮，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也表现在文学中：20世纪60—70年代台湾作家聂华苓、白先勇等开办的当代“留学生文学”，在80—90年代，就为来自大陆的查建英（小楂）、严歌苓等所承续，而且有新的发展。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进入大陆也与发表之时较大的时差，这是因为大陆的文学消遣和消费功能的凸显要到80年代中期以后。但是，大陆的阅读和研究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表现出要将金庸和古龙“正典化”的特殊心态，耐人琢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首先是在台湾发表和获奖，然后才回流到大陆，并且以慢热的方式逐渐升温，也是一种文化时差中的典型案例。

就时代语境而言，虽然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各自政治环境和地域特色各有不同，却必须共同面对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迈向现代性进程中的精神困惑和时代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形成对峙，而东亚地区的现代性进程却获得了空前的机遇。50—60年代的香港，60—70年代的台湾，80年代以来的大陆，相继启动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建设机制，取得了经济腾飞的巨大成就。就文学的发生发展而言，作为后发展中的东方国度，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汇与冲突，历史大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和偶然的、无可回避与人为造成的种种，喜剧与悲剧，血泪与荣光，以及社会现实折射在人们心头的精神的、伦理的、情感的巨大撞击和进退抉择的重重矛盾，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主题。我们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其长篇力作《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这样的感慨，也在余光中散文《四月，在古战场》中出现：“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想。”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的烟熏成早熟的熏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20世纪70年代，台湾作家尉天骢在他主编的《文季》上就曾经宣称：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 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 / 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 / 殖民地流毒， / 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 / 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 / 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 / 恐怖政治的战争， / 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 / 因此， / 他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和 / 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 / 他必须走入社会， / 铲除自私， / 关心别人，而且要 / 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 / 学成为一个 / 中国人。20 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 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多重社会矛盾和精神困惑交叠在一起，社会舞台和心灵世界的冲突与挣扎、绝望和希望、灭亡和再生、裂变和觉悟、恐怖和反叛，高度密集地凸现在现实生活之中，东方西方，古代现代，革命改良，男性女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都充满了喧嚣和嘈杂。而且，由于各自的地域政治，这些问题又形成各自的特点。

政治制约、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互补

中国当代文学的鲜明特征，是政治制约、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的互补。

狭义的政治是指现代政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方针政策，广义的政治是指在一个历史段落中的意识形态特征。而无论是从狭义的还是广义而言，20 世纪的中国和同期的文学，都深受其影响。20 世纪的中国，是以政治为先导和支点的；以理论为前导、观念先于存在、思想引导实践的有意识有目的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运动包括文学运动的重要特征。作为东方的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度，以奋起直追的姿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追求现代性，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也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日本当代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区分为两种类型：自发生长性和目标引导性。依照这种理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是属于自发生长性的，英国实现商业扩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化，是社会各种要素互相促进、自然生长、瓜熟蒂落的；此后，以英国的民主政治和工业社会为模式而追求国家的近现代化的国度，都属于是目标引导性的，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理念先行、思想观念引导社会前进的国度，而且，越是落后、越是向着近现代化目标起步较晚的国家，其目标引导的色彩就越是浓厚。“如果用列宁的用语‘自然成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来表达，那么，相对‘后进’的国家的近代化可以称作‘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越是‘后进’国，越具有